

中國都市化過程中新興的 「農民收租階級」： 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轉型路徑、 集體抗爭與福利政策

劉雅靈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主要探索在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城中村」的發展與「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本文建立在以租金為基礎的階級概念(rent-based class concept)上，建構「農民收租階級」理論，並從農村集體產權與戶籍制度出發，強調農民收租階級意識與階級利益不僅被農村集體產權所形塑，更被戶籍制度所增強，階級間的分配衝突也因此而衍生。本文分析並比較浙江溫州與江蘇無錫城中村轉型的相對停滯與成功，農民收租階級集體抗爭強弱的差異，以及兩地所採取不同的福利政策。本文從制度論出發，認為鄉鎮原有治理結構的延伸或斷裂，以及地方治理的務實傳統，解釋溫州與無錫都市化發展以及城鄉福利銜接的不同。本文強調雖然中國市場經濟轉型始於農業去集體化，但都市擴張中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是社會主義再集體化的表徵。

關鍵詞：城中村、農民收租階級、租金為基礎的階級概念、去集體化、再集體化

The Rise of the Peasant Rentier Class in Urbaniz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Path and Welfare Policy of Urban Villages in Wenzhou and Wuxi

Yia-Ling Li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ent-based class thesis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urban villages and the rise of peasant rentiers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t argues that rentiers'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interests are not only shaped by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but also enhanced b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divergent paths toward urban transition and welfare coverage,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the rentier class's collective protests in Wenzhou and Wuxi. It argues that effective supervision in local governance and frequent local-state interventions account for much of the variation in urban transition between Wenzhou and Wuxi. It also stresses that despite decollectivization central to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the rise of urban villages and the rentier class represents r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Keywords: peasant rentier class, urban village, communal property rights, urban-rural welfare coverage

中國三十年的市場經濟轉型，相對成功的帶動工業化、商業化與都市化發展。尤其自 1990 年代末當中國都市化發展成為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目標之一，全中國各地城鎮皆積極擴張都會區域面積，兼併農村郊區，減少農村人口，以回應上級政府都市化政策目標之要求。¹就在中國都會擴張之際，出現「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

在都市化過程中，城鎮公共建設、道路、橋樑、房地產開發、商業活動等均向外延伸，不僅改變城市外觀，也徹底改變城郊農村面貌。農村土地不斷被徵用，納入都市計畫與更新藍圖，不僅成為都市工業、商業、住宅與公共設施的預定用地，而且許多郊區農村在城鎮擴張中已發展為商業鬧區，村民也多數轉業在都市謀生。這種因城鎮擴張而納入都市行政體系的農村，被大陸學者稱之為「城中村」（李培林 2003；藍宇蘊 2005；鄭孟煊、黃紹汪 2006），或人類學家稱之為「農村隔離區」(village enclave) (Siu 2007)。

今日城中村農民在都市轉型中已喪失耕地，並缺乏專業技術與其他謀生計能，難以在城市就業。然而村民卻在農地徵用，獲得農民安置房補償後，得以將多餘房間或原有農村宅基地老舊房舍出租給外來民工，² 轉變為收取租金(rent)的房東，仰賴房租而活。另方面，在都市擴張與工商業發展衝擊下，土地供應不足造成地價暴漲，農村作為集體土地所有者，趁此機會發展與土地相關的開發與租賃事業獲取暴利，成為農村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不僅支付村的行政開支，並以紅利形式補貼村民生活津貼、醫療保健、養老津貼以及其他社會福利與救助。顯然城中村農民除個人房租收入外，同時享有村集體資產衍生的社會主義集體租金(socialist rents)。因此不論在職或失業，中國「城中

1 中國政府自九〇年代中葉以後，將都市化的城鎮發展列為地方執政考核項目之一。為追求城鎮發展的政策目標與考核績效，各地方政府積極擴大城鎮行政管轄範圍，併吞周圍農村，推動都市建設。

2 根據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甌海區國土資源所幹部，農民在農村居住的房舍所在地，稱做宅基地。當農民因嫁娶或兄弟分家需要蓋新房時，須向村委會申請宅基地，經批准後才得以蓋房子。宅基地的面積有嚴格規定，農民蓋房子時不得超過規定面積。目前在中國沿海經濟發達省分，因城鎮擴張需徵用農村土地，導致農村宅基地的分配已經停止。

村」的村民在經濟轉型中儼然從身分團體變成農民收租階級(peasant rentier class)，不僅尋求租金最大化，而且在強大階級意識下組織集體行動，維護階級共同利益。如何解釋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

更有甚者，當昔日農村併入城鎮行政管轄體系之內，這些城中村卻仍沿用昔日農村之名，而且村民拒絕轉變城市戶口，不願登記為城市居民，顯然農村集體主義意識增強，農民對村集體的認同遠超過所在的都會城鎮，似乎昔日毛統治下城鄉二元結構中被踐踏為二等公民的農民，已獲得翻身機會，在中國都市化發展中農民身分地位與所獲之利益遠高於城市居民，以致農民不願放棄農村戶口轉變為城市居民。如何解釋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城中村」農民身分地位的轉變？為何農村集體主義在中國都市化發展之際死灰復燃？「城中村」的轉型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是去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³ 或再集體化(recollectivization)？

在全球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市擴張與更新皆引發地價上漲而使地主獲利。但在中國都市地價上漲促使「城中村」村民自我組織，以集體示威方式捍衛村民的集體資產，不僅抗議資產被村幹部侵奪，而且引發村民與「前村民」(ex-villagers)之間的分配衝突。為何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土地所有者只是個別獲取租金的受益者，而在中國作為集體土地所有者的「城中村」村民不僅集體受益，而且轉變為收租階級？

本文主要探索在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城中村」的發展與「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本文採取以租金為基礎的階級概念(rent-based class concept)，認為農民收租階級意識與階級利益不僅被農村集體產權衍生的租金所形塑，更被戶籍制度所增強，階級間的分配衝突也因此而衍

3 中國農村在1978年底實行的農業去集體化改革，取消農村對農民的統一勞動、管理與分配，並將農地分配給農民進行個別經營，讓農民獲得對土地經營的自主權，但農地所有權仍屬於農村集體，為集體產權。農民並沒有獲得土地所有權，只有承租土地的使用權與獲益權。換言之，在去集體化改革中，農村耕地並未進行私有化，農地仍為集體所有。

生。本文進一步分析並比較浙江溫州與江蘇無錫對城中村的治理，探討兩地城中村轉型速度的快慢，農民收租階級集體行動的強弱，以及兩地對城中村村民為何採取不同的社會福利政策。在制度論基礎上，本文從村與鄉鎮原有治理結構的延伸，以及地方治理自主務實的歷史遺產，解釋溫州與無錫都市化轉型的差異。

本文的資料蒐集主要來自田野調查與文獻閱讀。作者於 2004 年至 2007 年的寒暑假分別前往溫州與無錫進行田野工作，前後共計七次，分別訪問溫州與無錫近郊的鄉鎮（街道）⁴ 與農村（城中村），訪問對象包括村民、村幹部、鄉鎮（街道）幹部、鄉鎮國土所與財政局，以及溫州與無錫市規劃局、國土資源局、社會保障局、農村集體資產改制辦公室（溫州區政府）等官員與幹部。為保護作者訪問過的村、鄉鎮與街道，在文中均以名稱中第一字的漢語拼音為代表。

本文論述分為下列六節，第一節解釋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第二節回顧大陸學者對城中村興起的解釋，同時指出這些理論解釋均忽視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第三節從租金為基礎的階級概念，解釋「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第四節則進行溫州與無錫都市化的比較。雖然溫州與無錫都市化過程中均出現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但兩地農民收租階級的內部利益衝突、城中村轉型的步調、農民集體抗爭的強弱，以及採行的社會政策有所不同。第五節則從農村治理結構的延續或中斷，以及地方治理的務實傳統解釋兩地都市轉型之差異。第六節則評估都市化對城中村村民身分轉變帶來的利弊。最後，本文認為集體產權與戶籍制度持續複製社會主義的集體性，促使中國市場與都市轉型中的再集體化現象。

4 中國農村與都市行政管理體系有所不同。在農村基層，村為自治體，其上級領導機構為鄉鎮政府。而城市行政體系的基層是居民委員會，今日又改稱為居民社區，其上級領導機構為街道辦事處。

一、「城中村」的興起與新興 「農民收租階級」

今日中國城市中之所以出現城中村，也就是都市裡的村莊或都市中的隔離農村，可追溯到 1958 年城鄉戶口制度的建立。中共建政初期，為在短期內超英趕美，實現國家快速工業化，不僅發展城市重工業，而且使用極權手腕強制轉移農業剩餘(agricultural surplus)，來補貼城市居民與國營、集體企業的勞工，這些優惠包括糧食補貼、副食品供應、低價住房、工作分配、子女教育、醫療保健、退休養老等福利(Lu and Perry 1997)。同時為避免農村大量人口遷入城市，分享城鎮居民的福利待遇，在中央政府財政緊縮下，建立戶籍登記，做為制度障礙，阻撓城鄉人口流動。戶籍制度將農民圈在農村，依附於土地，沒有特殊允許，農民不得隨意進入城市。中國農民被國家發展政策所犧牲，像西方中世紀封建體制下的農奴，缺乏遷徙自由，遑論進入城市，社會流動機會極其有限。⁵由於農民無法分享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與權益，必須靠自己生產的農業剩餘做自我照顧。農村缺乏政府提供的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農田灌溉的水利設施都由農民體力勞動，自我建設完成。城鄉之間成為現代與傳統的對比，兩者之間缺乏溝通與互動，城鄉通婚雖未完全絕跡，卻也少見。在毛統治年代，中國幾乎成為準隔離社會(semi-apartheid society)，更由於中國農民不完整的公民權，在政治與社會上備受歧視，遂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二等公民。正因為如此，當時城市居民身分成為農村極為短缺的搶手貨，若農民能轉變戶口登記為城市居民，猶如一步登天。

(一) 城中村的形成

毛時代建構的城鄉二元社會制度遺產，一直延續到今日的市場經

5 在毛統治年代，中國農民向上流動的機會極小，只能靠參加軍隊、考入大學等管道。

濟轉型，難以打破。縱使當今中國城市快速擴張，兼併城郊農村，甚至已將農村置入城鎮管轄體系，但農村名稱及村落位置仍原封不動。溫州市原屬郊區的許多農村，隨城市行政區域擴張，今日已變為城市繁華鬧區的一部份，雖然農地已被城市徵用完畢，但仍維持原有村落位置與名稱。相對而言，無錫許多城中村已逐漸完成都市轉型，村民已轉移到隸屬不同街道的社區安置房落戶，戶口也轉變為城市居民，原有的村落遂被解散，但農民安置房所在的都市社區仍帶有農村生活習性，村民房東與外來民工房客混居。

今日溫州城中村的田園景觀已完全消失，並與城市的高樓大廈混合，原有的農地也已開闢成為工業區、商業區、住宅區，或公共設施的公園。市區商業大街兩邊的商家店鋪，不少是徵用城中村土地所建，村落則散佈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商家店鋪之後。一旦轉入交通幹道與商業大街的背後，舉目所見是狹窄彎曲、凹凸不平的小巷，道路中間水窪點綴，巷角垃圾堆積，異味橫行，髒亂成為常態。雖然村落民房新舊交錯，高矮參差不齊，與廣州城中村相比（藍宇蘊 2005），溫州村落民房並未向上任意加蓋，沒有雜亂無章不見天日的景象。溫州城中村內仍居住許多村民，但也有不少搬遷到市區高樓住宅，而將原有村落民房出租給外來民工。與眾多城市的城中村相同，許多外來民工職業不固定，教育程度與收入偏低，形成危害城市治安的犯罪地點，原有城市居民避之唯恐不及。但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治安問題似乎不如廣州城中村嚴重。

無錫城中村的進展雖較溫州為快，但至今仍有大批城中村等待改造。尤其無錫市政府訂定年度政策目標，每年必須吸納 250 畝周圍農村進入城市管轄範圍，並將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延伸給併入城市範圍的村民。⁶ 無錫市相當重視城市總體規劃與建設，不僅完成無錫市未來發展規劃藍圖，並在都市下轄的行政區與街道做細部規劃與建設。無錫市下轄的基層行政單位——街道，在政策目標壓力下，限期

6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規劃研究院，2007 年訪問無錫市規劃局官員。

拆除城中村以配合都市總體規劃，⁷顯然無錫城中村的改造是出於城市規劃發展與建設的需要。此外，當城中村村民改變為城市居民的同時，必須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福利與權益，因此無錫城中村的改造與社會保障同步並行，溫州則有所不同，走向市場化的商業保險。

不論溫州或無錫，城中村皆擁有許多與土地相關的集體資產，包括土地與房地產出租的租金收益、村集體企業的利潤，以及其他投資事業的營利。這些資產屬於村民全體，因此城中村在併入城市之際，不容上級政府侵犯與占有屬於村民全體的集體資產。市政府所能做的是透過法定程序徵用農村土地，而且徵用農地必須補償農民損失。當農村併入城市，農村無法立即轉變成都市居委會，⁸原因在於郊區農村因土地價值暴漲而累積大筆財富，在農村集體資產未得到妥善處置前，農民拒絕變更身分為居民，更拒絕城市的管轄與控制。與無錫因應城市總體規劃必須改造城中村的壓力不同，溫州城中村村民發覺村集體財富在地價暴漲之下急速增值，在目睹村幹部生活奢華與貪污腐敗不時發生之際，提出分享集體資產利潤的要求，但由於村財務時被操弄，村幹部又常做錯誤的投資決策，造成集體資產大量流失，村民喪失對村幹部理財能力與廉潔的信心，遂要求分光村集體資產作為改變城市居民身分的前提。⁹溫州城中村經常因集體資產處置不當或利益分配不均爆發村民的集體抗爭遊行，而城中村的上級政府，在原有鄉鎮被撤銷而由城市街道接管之際，受限於人員編制與有限資源，街道往往不願介入城中村內部難以理解的複雜土地產權糾紛與宗族關係，以致溫州城中村像城市中的孤島，被城市包圍，但又具有自治

7 作者 2005 與 2007 年訪問無錫市規劃局與之下的規劃研究院，瞭解無錫市的都市總體規劃與細部建設。作者又訪問無錫市崇安區下轄的 Guang 街道，瞭解 Guang 街道如何在落實細部規劃的壓力下處置與分配城中村的集體資產，以及宅基地拆遷和村民安置事項，這是城中村改為社區居委會的前置作業。

8 中國城市行政管理體系在九〇年代末產生變革，已將原先處於城市最基層的居委會改變為社區，接受上級街道管轄。

9 作者 2006 年溫州田野調查時，城中村村民因集體資產分配以及村幹部的貪污腐敗，而上街頭抗議。類似的抗爭活動早在本世紀初就已發生。

權。

在中國急速的都市轉型中，城中村現象在各級城市中已極為普遍，縱使中國政府缺乏城中村的詳細統計數字，但有關各級城市城中村的數據散見學術研究與新聞報導中。例如廣州市城中村在 2005 年共有 139 個（藍宇蘊 2005: 7），陝西省西安市在 2002 年有 417 個城中村與 42 萬村民，山西省太原市有 75 個城中村與 12 萬村民，浙江省紹興市有 45 個城中村與 15 萬村民，河北省石家莊市有 45 個城中村，浙江省杭州市有 60 個城中村等（藍宇蘊 2005: 2；鄭孟煊、黃紹汪 2006: 11）。溫州市在 1994 年就將鄰近甌海縣併入原有的鹿城區與龍灣區，擴大為三個行政區，2004 年溫州市下轄 70 個城中村、334 個城郊村與 139 個農村，共計 82.2 萬農民（謝健等 2004: 36）。相較之下，無錫市在 2001 年擴大納入原為無錫縣的錫山市，將原有都市行政區從一個變為七個（王安齡 2007: 1）。¹⁰ 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都市化正方興未艾，城中村現象愈來愈普及。

（二）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

與英國中世紀圈地運動造成的農民流離失所不同，中國農民在農地徵用與房舍拆遷後，多數遷入政府補貼的農民安置公寓，做為失地補償之一。如同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際，工人被迫與生產工具分離，中國城中村民在都市擴張農地徵收後，被迫與耕種工具——土地——分離，因此多數村民已不再從事農耕，而進入城鎮的正式與非正式經濟部門尋找就業機會，幸運者找到全職工作，許多是兼業性質，甚至更多因缺乏謀生技能而失業。城中村民的兼業多集中在城鎮的中下階層工作，包括街頭小販、出租車或卡車司機、小吃攤經營、清潔工作者、裁縫、工廠勞工等。但不論就業與否，溫州與無錫絕大多數城中村村民均靠出租房舍與公寓為生，同時仰賴村集體發放的生活津貼、貧困救助、教育補貼、老人津貼、與部分醫療照顧等社會租金而活，

10 今日無錫市包含崇安、錫山、惠山、北塘、南長、新區、濱湖七個行政區。

因此村民不必參與勞動過程與就業，就能依靠個人的房租收入與村集體的社會主義租金維持基本生存，儼然成為收租階級。

城中村村民清楚意識到村民身分是獲得社會主義集體租金與房屋租金的唯一資格認定，因而村民之間具有濃厚的村集體意識，他們是村集體資產的所有者與分享者。村民收租階級會以集體的階級行動維護集體資產的所有權，並匡正被侵犯的資產權益，城中村民的抗爭行動發生在溫州比在無錫多。如何解釋溫州與無錫農民收租階級抗爭行動的強弱差異？在回答此問題之前，有哪些理論觀點解釋中國城中村與村民收租階級的興起與發展？

二、城中村興起的理論回顧

大陸學者對近年都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城中村現象十分關注，尤其對城中村的社會組織、經濟制度與文化生活均有詳細描述。例如新村舍共同體觀點認為被城市包圍的城中村，是傳統農民社區(gemeinschaft)與現代商業社會(gesellschaft)的混合體。鑲嵌在都市經濟中，新村舍共同體一方面被傳統的人際關係、相互信任、家庭忠貞所凝聚，另方面又必須適應都會陌生人之間的片面互動與城市生活（李培林 2003；藍宇蘊 2005；鄭孟煊、黃紹汪 2006）。不論失業與否，城中村民具有強烈的集體村民意識，共同享有村集體資產與租金。此外，新村舍共同體觀點也討論城中村資產重組與紅利分配，以此凝聚村民的集體意識（Siu 2007；藍宇蘊 2005；鄭孟煊、黃紹汪 2006）。都市化論述則認為城中村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短暫的過渡現象，最終將會融入都市而消失。持此一觀點的學者更關切都市擴張過程中是否能提供充分的居住空間、水電供應、公共財與社會服務，以滿足都會居民需要。在此前提下，有些學者將焦點鎖定在都市中社會層級(social hierarchy)結構的轉變(Zhang 2008)，有些則使用市民社會觀點解釋農民從下而上獨立建構的城鎮，如八〇年代在溫州蒼南縣成立的龍港鎮，由農民集資進行基礎建設，並興辦公益與文化事業（朱康對

2003），有些則從鄉鎮政府組織力量出發，透過基層政府自籌財源，完善城鎮規劃與建設，如無錫玉祁鎮的發展（唐岳良、陸陽 2006: 75-102）。甚至有學者討論都市不同部門之間爭奪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地租占有等的權力政治(Hsing 2008)。

雖然新村舍共同體與都市化觀點對城中村居民的都會生活與社會組織提供深入分析與見解，但它們都忽略建立在社會主義租金基礎上的農民收租階級之興起。他們更忽略收租階級內部發生的租金分配衝突，以及收租階級發起的集體行動，以實際行為宣稱他們擁有村集體資產的共同利益與不容侵犯之產權。本文提出收租階級理論(thesis of peasant rentier class)來界定中國都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村民，尤其建立在集體產權制度上的社會租金、村民認同的階級身分、村民發動的集體行為確保村集體資產所有權與租金最大化追求，最能解釋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城中村」的崛起與村民收租階級維護財產權益的階級行動。

三、收租階級理論的建構

在探索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瓦解與捷克斯拉夫的分裂時，西方學者提出新階級理論(the new class theory)，認為建立在知識壟斷基礎上的新階級主導東歐共產政權的轉型，這些新階級包括部分知識份子、技術官僚、工程師與政府部門官員(King and Szelenyi 2004; Eyal 2003)。雖然新階級理論著重異議知識份子與技術官僚之間的階級聯盟，共同完成東歐共產政權瓦解與資本主義轉型的任務，但新階級理論並未探索東歐後共時期的階級結構，也難以應用解釋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更遑論解釋中國都市化過程中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

使用階級概念區分社會中人群的差異，仍是今日中國社會的政治與學術禁忌，大陸學者多半避而不用，或寧用較為中立的階層替代政治敏感的階級概念(Zhang 2008)。另方面，在社會學研究中階級概念也引起許多爭議，尤其馬克思從勞動過程中以擁有生產工具為基礎的

階級界定過於狹隘，故當代社會學家超越馬克思的階級定義，從個人所擁有之財富、權威、知識所產生的租金，以及掌握這些租金的權力與權利，來界定個人所屬之階級，因為這些租金報酬會進一步影響個人在市場中的生活機會(Wright 2005; Breen 2005)，決定個人的社會流動。在主流經濟學中，租金相當於因擁有財富、權威與財產而衍生的收入、利潤與回報(Buchanan 1981; Sørensen 2005)，因此有學者認為以租金為基礎的階級概念而非生產工具的掌握，更能有效掌握階級意識與階級對立的剝削觀點(Sørensen 2005)。不論新馬克思或新韋伯學派，階級分析主要探索階級形成、階級不平等、與敵對階級之間的分配衝突。不論階級概念隱含剝削與否，本文認為中國都市轉型中的農民收租階級是以享有村集體資產衍生的社會主義集體租金為基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也就是村民小組、大隊、公社三級所有。精確的說，農民作為土地共同所有者，有權利使用村的集體土地，但農民並非土地的個別所有者。社會主義集體租金從土地共同所有權衍生出來，應被全體村民所共享，所以在中國農村脈絡下，農民收租階級的界定是以享有社會主義集體租金為基礎，不僅獨立於占據階級結構位置的職業或收入，而且以戶籍制度中登記為農民身分的村民決定收租階級的界線(class boundary)。與教育文憑或專業證照的作用類似，村民身分使收租階級成為封閉團體，排除農村中非村民身分成員。

城中村的集體資產在中國都市化過程中迅速膨脹，尤其在地價暴漲中，城中村與城郊村皆趁機進行土地投機與商業化經營，獲得暴利租金，成為村鎮預算外收入主要來源。在地價上漲的基礎上，許多村落繼而發展與土地租賃相關的經營活動，賺取固定租金。縱使各村因地理位置不同，地價有所差異，所獲土地租金也有所不同，但幾乎城中村民均享有地租衍生的生活津貼、教育補貼、老人年金、貧困補助、醫療保健等。村民甚至將補貼安置房的多餘房間出租，收取個人租金。故不論失業與否，城中村民作為村集體資產的共同所有者，在中國市場轉型與都市化過程中的生活機會均獲得改善。為擴大地租的

分享，城中村民會自我組織進行抗爭，一方面防範幹部侵吞集體資產，另方面阻止已移居城市的原有村民回流，要求分享財產。

本文提出農民收租階級的論述觀點，是以社會主義集體資產所有權為制度基礎，闡述新興農民收租階級成為中國市場與都市轉型中的受益者。做為農村集體資產的共同所有者，農民收租階級不僅追求租金最大化，並極盡所能保護他們的集體資產與共同利益。由於村民身分與租金分享結合，農民收租階級對村民身分具強烈認同感，農民身分已成為收租階級的集體意識，他們用此抗拒已轉變身分的原村民分享租金與村幹部的侵吞集體資產。以下則是用租金為基礎的階級概念來瞭解溫州與無錫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並比較他們階級行動強弱、城市福利銜接以及城中村轉型快慢的差異。

四、溫州與無錫的新興農民收租階級

溫州與無錫均為中國沿海省分最富裕地區，自八〇年代初期就因善用地方資源秉賦與比較利益，以農村私營經濟與鄉鎮集體企業，創造地方經濟奇蹟。不論城鎮與農村，溫州與無錫人均收入均遠高於全國平均，見表一。

表一 溫州、無錫城鎮與農村人均所得，2000-2007（單位：人民幣元）

人均所得 \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溫州								
城鎮人均所得	12,051	13,200	14,591	16,035	17,727	19,805	21,716	24,002
農村人均所得	4,298	4,683	5,091	5,548	6,202	6,845	7,543	8,519
無錫								
城鎮人均所得	8,603	9,454	9,988	11,647	13,588	16,005	18,189	20,898
農村人均所得	5,262	5,524	5,860	6,329	7,230	8,004	8,880	10,026
全國								
城鎮人均所得	6,280	6,860	7,720	8,472	9,442	10,493	11,759	13,786
農村人均所得	2,253	2,366	2,476	2,622	2,936	3,255	3,587	4,140

資料來源：金浩、王春光(2008)，2008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無錫市統計局(2000-2007)，無錫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0年至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8)，中國統計年鑑 2008。

溫州由於地方政府較寬鬆的政治管制與地方自主，在改革前後家庭作坊與私營企業蓬勃發展，無錫則因嚴密的政治控制，走向集體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當九〇年代中國短缺經濟不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集體所有權性質的鄉鎮企業不敵經濟效益較高的私營與外資企業，被迫走向全盤私有化。為填補集體甚至國營企業私有化之後的空窗，無錫積極引進外資企業，以外商雄厚的資本、技術、外銷實力再創地方經濟光環（方勇、張二震 2007；談鎮 2007）。¹¹ 溫州因遠離長江三角洲，始終不是外資的優先選擇，因而自始即依靠本土資金，以家庭作坊與中小企業形成的生產網絡，不僅搶占大陸國內市場，並以勞力密集產品行銷國際低價市場。兩地發展路徑雖然不同，但溫州與無錫市場經濟轉型與城市逐步擴張，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皆是兩地社會變遷中的新興普及現象。

（一）農民收租階級的集體所有權與村民身分認同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雖排除個人所有者，但建立在宅基地之上的房舍屬於農民個人所有。如果在農村土地徵用中包括農民宅基地的房舍，農民除得到房舍拆遷的賠償金之外，還可以獲得購買政府補貼的安置房公寓作為補償。溫州農民可以獲得原來宅基地房舍面積三倍大的安置房補償，這通常相當於兩到三套的安置房公寓，視公寓面積大小而定。¹² 無錫農民宅基地房舍補償沒有像溫州那麼慷慨，但通常無錫農民也都購買兩套補貼價格的安置房公寓；有些農民在購買安置房之後，立刻以市場價格出售給其他居民，賺取暴利差價。¹³ 雖然溫州與無錫農民在徵地補償上有所差異，但兩地城中村民多數成為房東，出租房舍賺取租金維持生活，使他們免於在勞動市場中尋找就業的勞

11 無錫地處江蘇南部，發展型態與蘇南各地極為類似，都於 1990 年代末做鄉鎮企業私有化，並引進外資，發展高科技產業。

12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 Shui 村村民，他原有宅基地房舍面積是 60 平方米，所以當房舍拆遷後，他可以購置 180 平方米的安置房作為補償。最後，他購買一大間 110 平方米與一小間 70 平方米的安置房公寓。

13 不論在溫州或無錫，規定安置房必須住滿五年之後才可出售，但有些村民未按規定行事，也有村民從一開始就將安置房的購買指標以市場價格出售給其他居民。

頓，可見城中村民做為房東收取個別租金，也因村集體資產——土地——被徵收而獲利。根據溫州鹿城區 Feng 村幹部：「本村有 80% 的村民靠出租房間與公寓維生，如果村民的公寓鄰近商業大街，租金收入更多，一年約可得到六萬元。」¹⁴ 無錫城中村分布也相當廣，以濱湖區 H 村為例，在 7,829 戶中就有 4,000 多戶出租給外來民工居住。無錫城中村內不僅房東多，失業人口也多，¹⁵ 但失業者多為房東，不愁生活無以為繼。

除私人的房屋租金收入外，作為村集體成員，村民還得以分享村集體資產租金。當溫州農村土地被徵用所剩無幾，徵用單位會返還一定比例的土地給村集體，作為村民生活依據，通常返還土地的面積是原徵用面積的 20% 到 30%。¹⁶ 根據政府規定，返還土地面積的 60% 可做為工業開發用地，農村可以蓋工廠廠房出租收取租金。剩餘 40% 的返還土地可用於發展服務業，如設立加油站、停車場、餐飲業等解決村民勞動就業問題。這些與土地相關的經營收益，可以作為村的財政收入與村民福利金的發放。根據溫州市龍灣區郊區的 Fu 村幹部：¹⁷

溫州市政府為擴大濱海工業區面積，在 2003 年向我們村徵收一千畝土地，除了每畝補償我們五萬元之外，我們還獲得 60 畝(6%)返還土地。我們打算利用這 60 畝返還土地做工商業用途，例如建工廠廠房、商業住宅、房地產開發等，我們收取租金，作為村的財政收入，並提供村民各項服務與福利。

溫州許多城中村因地價上漲，使村集體資產增值而收入增加，根據溫州鹿城區 Jiu 村幹部：¹⁸

14 作者 2006 年訪談溫州鹿城區 Feng 村退休幹部。

15 參考政協無錫市委員會(2008)。

16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甌海區國土資源局分局幹部。原則上農村可以獲得原徵用地 20% 到 30% 的返還土地，但實際上村所得返還土地面積遠低於政策宣示。

17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龍灣區 Fu 村幹部。

18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 Jiu 村幹部。

我們村資產在 2003 年就已累積超過二億元，包含一家村辦餐館，一家印刷廠，以及商店店面、市場攤位、公寓出租等。自從村民發現村集體資產每年利潤暴增，遂提出分享紅利要求。我們遂於 2003 年開始發放福利金，男性村民年滿 35 歲每月可得 1,000 元生活津貼，女性可得 600 元，男性 15 歲以上 35 歲以下每月津貼 300 元。村對高中生與大專生有學費補貼。此外，村每月發放老年津貼與部分醫療補助。你覺得我們村福利做得很好？才不是！我們隔鄰 Song 村福利做得更好，他們還可以提供老人免費出國旅遊。

溫州鹿城區 Shui 村的村民福利比 Jiu 村更佳，根據 Shui 村幹部：¹⁹

我們村在 1996 年組織企業集團，包括所有租賃事業與超市連鎖店，我們出租工廠廠房、店面、公寓等，每年租金收入可觀。自 2001 年當村民發現村有鉅額收入，便要求分享，但村主任拒絕，村民就發起罷免村主任的行動，我們是溫州第一個罷免村主任成功的村。就在罷免村主任活動中，村開始發放福利金給村民，目前 25 到 60 歲之間的男性村民每月可領取 1,200 元生活津貼，女性 840 元，村民滿 18 歲也有津貼可領。村民年滿 65 歲每月可領老人津貼 700 元。此外還有低廉的老人公寓與餐飲提供。村民還享有醫療照顧，可向村裡報銷 80% 的醫療費用。

當溫州城中村將村民置於村集體保護之下，無錫城中村民也享有村集體資產的紅利，但待遇不如溫州村民豐厚。又因為無錫強調城市總體規劃，無法像溫州那樣在徵收農村土地後返還一定比例的留用地，幫助村維持生計。縱使目前無錫市已有區政協機構呼籲返還部分

19 作者 2004 與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 Shui 村幹部。

徵用地給城中村，²⁰但在城市總體規劃要求下，無錫市政府難以辦到。反而無錫市政府要求城中村在轉型中將原有村集體資產組織成股份合作公司，承擔村民銜接城市居民養老與醫療保險的財政負擔。根據無錫 Yiu 村幹部：²¹

我們村過去靠村辦企業提供財政收入與社會服務支出，但在鄉鎮企業私有化之後，我們主要收入來源轉變為租賃經營，包括出租工廠廠房、店鋪、市場攤位等，租金收入一年超過一千萬。我們已經將這些資產組織為股份合作公司，將村民變成股民，分享紅利。在 2002 年每個村民領到紅利 600 元，2003 年增加為 800 元，包括小孩。那些已變更為居民身分，但過去對村的發展有所貢獻的村民，也領到紅利一年 400 元。此外村支付老人津貼每月 300 元，提供村民每人每年 240 元的醫療補助，其中村民需自付 80 元。失地農民還可領取失業救濟。我們村捐助村小學電腦教學，幫村民支付有線電視年費，補助退休村民國內旅遊等。

兩相比較，雖然溫州村民的集體租金與紅利優於無錫，但這只局限於資產雄厚的城中村，不是一般普通農村所能享有的。不論溫州或無錫，兩地城中村與土地相關的租賃經營獲利頗豐，皆提供村民社會主義集體租金的分享與相對慷慨的福利照顧。建立在村集體資產上的社會主義租金制度，不僅改善村民在市場中的生活機會，而且將他們轉變為收租階級。由此可見，中國都市轉型中村集體資產與村民身分認同的戶籍制度，共同形構農民收租階級的興起。

相較之下，廣州城中村村民熱中於投資原有宅基地房舍的擴建與

20 無錫市濱湖區政協委員會在 2008 年對無錫市建設局提出城中村改造相關政策建議中，要求市政府在改造中拿出一定量的土地（留用地政策），作為商業開發滿足村股份合作資產收益的用途。見政協無錫市委員會(2008)。

21 作者 2004 年訪問無錫市 Yiu 村幹部。

加蓋，發展租賃業務，成為房東招攬外來民工房客，依靠租金收入而活。和溫州相同，廣州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大量徵收農村土地，徵用單位會返還一定比例的留用地給村民做為生活依據，例如廣州 Shi 村自 1979 年以來經歷多次徵地，已累積徵地單位返還的留用地 450 多畝，成為該村發展租賃經營業務之來源（鄭孟煊、黃紹汪 2006: 53）。廣州市雖未像無錫那樣嚴格要求城中村提供村民與城市居民等同的社會保障，但已責成城中村將集體資產組織成社區股份合作經濟聯社，將集體資產所有權以股份形式分給個人，並更進一步將股份合作經濟聯社轉變為企業集團公司，擔負新興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與基本生活。但不論村民或居民，建立在社區集體資產所有權與社區居民身分認同上，新興收租階級已在中國都市化過程中產生。

（二）農民收租階級的利益分配衝突

村集體資產與村民身分不僅鞏固城中村民的凝聚團結，更排除「前村民」分享村集體資產與租金的權利要求，因為他們已搬離村落移居到城市，並改變原有的村民戶口登記為城市居民。但這種社會排除激怒那些曾經對村發展有所貢獻的前村民，他們回到原村進行抗爭，要求分享租金與資產，引發城中村內部的利益分配衝突，並引起中國各都會城市政府的注意。為平息利益衝突，廣州市與無錫市城中村在上級政府協調下，允許已改變城市居民身分的前村民分享村集體資產，但分配加權比重較輕，以平息村民潛在的不滿與爭議。²²

當中國城市擴張，不斷徵用農村土地，失去耕地的農民勢必要轉變為城市居民，而且徵地單位必須提供就業機會給失地農民。按農村過去慣例，通常有三種方式可以改變村民為城市居民：(1)勞力安置：不論政府機構或國營企業，只要徵用農村土地，就必須提供工作給失地農民，幫助他們在城市就業，並轉變為城市戶口。在溫州按規定每

22 廣州市城中村的做法，參考藍宇蘊(2005)著作，有關無錫城中村的做法來自作者 2004 年訪問無錫 Yiu 村與 2005 年訪問無錫 Xiang 村幹部。

徵一畝農地，必須安排兩個農村勞動力轉業。²³ 例如溫州市財政局過去曾徵用 Jiu 村農地，除以現金補償徵用農地外，財政局按規定必須提供若干工作機會給失地農民，並幫助他們轉變為城市居民戶口。²⁴ (2)貨幣安置：若用地單位無法提供工作機會，則可對失地農民提出個人金錢補償，並改變農民身分為城市居民。(3)購房安置：當村在政府返還的留用地上建公寓樓房，並讓村民以優惠價格購買，但附帶條件是凡購買者必須同時改變身分為城市居民。²⁵ 然實際上許多村民接受了城市單位的工作安排，有的也接受了個別金錢補償，也購買了補貼價格的公寓，但是並沒有改變農民身分。或者有些已經提出申請，但不知為何並未成功的轉變為城市居民戶口。所有這些均構成溫州城中村村民之間的分配衝突，導致村民分享集體租金與資產的資格紛爭。資格認定的唯一標準是村民戶口登記為本村村民身分，但不管是否仍登記為本村村民，只要他／她曾接受就業、貨幣、認購補貼價格公寓當中的任一選擇，就已經不再視為本村村民，而被排除集體資產與租金分享之外。

當村民改變登記為城市居民戶口，後者享有的城市福利待遇就必須延伸給新註冊為居民的村民，但是城市政府財政困窘，無力負擔額外的福利照顧，因此要求城中村保留村集體資產，以資產衍生的報酬租金來支付村民轉變為居民的社會福利照顧，但溫州與無錫城中村採取不同的方式處置村集體資產。無錫城中村所有集體資產原封不動的被組織成股份合作公司，支持村民轉變為居民所應享有的城市福利待遇，但溫州多數城中村民要求將集體資產全部拍賣，讓所有村民均分拍賣所得。溫州村幹部經常濫權經營與侵吞村集體資產，貪污腐敗層出不窮，導致溫州村民對村幹部失去信任，而且當集體資產組織成股份公司後，村民又無力有效監督幹部的經營管理，因此要求在全部村

23 勞力安置在各地略有不同，如在廣州每徵一畝地，徵地單位必須安排 1.5 個農民勞動力就業，見藍宇蘊(2005)著作。

24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 Jiu 村幹部。

25 作者 2004 與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與 Feng 村的幹部與村民，村民均認同幹部所說的村轉居三種方式。

民轉變為城市居民與村解散之前分光所有村集體資產。根據溫州鹿城區集體資產改制辦公室幹部：²⁶

鹿城區許多城中村村民都曾上街遊行示威，要求分光所有村集體資產，但到目前為止，鹿城區 29 個城中村當中，只有 Hong 村完成資產分光。其他許多城中村都模仿 Hong 村的做法，但都卡在村民分享資產的資格認定上。

在做集體資產均分之前，必須要做村民資格認定與集體資產評估。根據溫州各城中村幹部，產生資格認定糾紛的第一類人是各村外嫁到別村或城市的婦女，這些婦女有的在出嫁後就將戶口遷出本村，但也有出嫁婦女戶口並未遷出，仍留在本村。然而不論她們戶口是否留在本村，出嫁婦女在傳統上已經不再視為本村村民，但她們回到村內來要求分享資產，尤其她們認定出嫁前對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貢獻，應使她們有資格分享集體資產。根據溫州 Feng 村一位退休幹部：²⁷

我們村外嫁到別地的婦女，不論戶口是否仍留在村內，在 2002 年的時候都上街示威遊行，抗議她們被排除村集體資產分享之外。當時的示威遊行在溫州市引起許多注意。為平息這些嫁出婦女的抗爭，我們村委會決定用錢收買，發放每一位嫁出女性 38,000 元，取得她們的切結書，了斷與村的關係。但是她們當中有些人拒領，也拒絕離開村落，因為她們嫌錢少。此示威事件在溫州具有傳染性，結果其他村的出嫁婦女跟進，包括 He、Song、Suang 村等婦女都上街示威抗議。

26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農村集體資產改制辦公室幹部。

27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Feng 村退休幹部。

第二類有資格爭議的是那些得到城市工作機會而應該轉變為城市居民的前村民，由於他們並未真正得到徵地單位或企業提供的工作，有些反而獲得購買補貼價格公寓的機會，因此他們應該放棄村民戶口。一旦他們購買補貼價公寓，不論其戶口是否仍在村內，他們已經不再被視為村民，可是他們認為既然沒有改變村民身分，他們就有資格與權利分享村集體資產。根據溫州 Shui 村幹部：²⁸

在九十年代初溫州市政府向我們村徵用土地，又按一定比例返還我們一塊留用地，我們遂在返還的留地上建住宅公寓，以補貼價格賣給村民。當時的條件是村民一旦購買低價公寓，就必須轉變身分為城市居民，切斷與村的關係。因此今天不論是否改變村民身分，只要購買了補貼價格的公寓，就已經不算是村民，無法分享村集體資產。然而當我們村委會宣布要拍賣村集體資產時，所有這些資格有爭議的人全跑回來要求分享資產，他們跑上街頭抗議被剝奪分享的資格，甚至以請願方式包圍市政府，把事情鬧大。為平息紛爭，我們村委會只好讓步，發放每人三萬元作為補償，感謝他們過去為村付出的勞力，以此交換他們簽字與村斷絕關係。

但根據 Shui 村一位女性村民敘述：²⁹

當我就讀高中時，一天村幹部上門告知，溫州市政府有提供廉價勞動安置房政策，幫助村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當時我父親在外地跑長途運販，人不在家，母親不識字，搞不清楚狀況。但看到左鄰右舍都願意購買安置房，並簽字願意遷出戶口，所以母親就決定這麼做了，但我當時並非自願轉變戶

28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幹部。

29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村民。

口。全家也只有弟弟與父親保留村民身分，未改變戶口。當時民風未開，村民很容易受騙操弄，我們搞不清楚為何當時幹部一定要我們改變戶口。後來才知道村要分光所有集體資產，當然愈少人分享愈好。當時許多已簽字改變戶口的村民非常氣憤，認為被村幹部騙了，就跑回來抗議。後來村發放每人三萬元作為補償，我也領了三萬元，自此與村切斷關係。

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溫州其他城中村，根據前述溫州 Feng 村退休幹部：³⁰

當我們村土地被市政府徵收建工業園區時，園區應當要提供 200 個工作機會給失地村民，但園區後來食言。於是園區採用現金補償使村民轉變為城市居民戶口。起先每個村民可得 2 萬 4 千元的補償，後來增加到 3 萬 6 千元，但是許多村民拿了錢並未轉變為居民戶口。我們村在 2002 年進行村主任選舉，約有 140 人的投票資格有爭議，因為他們獲得現金補償，已經喪失村民資格。但是他們發動示威遊行，抗議投票資格被剝奪，又吸引本村 70 位外嫁婦女一起加入，在溫州市鬧得轟轟烈烈。

第三類資格有爭議的是土地被徵用後搬到城市，並遷出戶口的男性村民。他們過去雖在徵地單位中工作，但農民教育程度低，又缺乏專業知識與技術，只能在單位中任職最低級的工友或清潔工，一旦國營企業做私有化改革或政府單位精簡人事，他們便被裁員，失業在家。但他們自認過去對村付出勞動貢獻，所以回到村落要求分享資產。這類人又包括早先放棄承包地而進城務工的經商者，如今也都回

30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Feng 村退休老幹部。

到村裡要求「討回公道」。³¹

在中國都市轉型中，還出現另一類位於城市底層的邊緣人，他們因接受某種安置被農村剔除戶口，但又未被城市接受為居民，這些人像人球被農村與城市相互推諉，不僅無法分享村落的社會主義集體租金和資產，而且又被城市福利體系拒絕。³² 他們失去制度附屬與連帶的權利，一旦制度保護撤除，他們完全受制於市場變動與浮沈。更糟的是他們的公民權益被剝奪，包括投票、受雇與福利，他們無處藏身，同時被城市與農村邊緣化。

相對於溫州，無錫城中村也發生分享集體租金的分配衝突，但不像溫州如此激烈，因無錫基層政府力量相對強大，事先就擺平不同資格類型村民之間的紛爭。當村集體資產以股份合作公司形式進行私有化時，它區分集體股與個人股來涵蓋資格有爭議的前村民。根據無錫 Xiang 村前任幹部：³³

我們村股份合作公司進行私有化時，分為集體股與個人股，各占集體資產的 50%，我們用集體股紅利支付村行政管理費與提供村民社會福利服務，個人股按不同加權量化到有資格分享的村民。每種不同資格的村民加權有所不同，得到的股份也不同。例如第一種資格是戶口在本村的現有村民。第二種是過去對村勞動貢獻較大的幹部、外調服務他鄉的幹部、非本村村民但曾在本村服務過的幹部，他們各有不同的加權。第三種是按年齡來加權。那些已改變為城市戶口，但對村有勞動貢獻的前村民是有資格分享的，嫁到城市的婦女也

31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政府官員。

32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一位女性村民，她對自己的戶口身分十分困惑。這位村民在十年前因為購置村的補貼價公寓，切斷與村的關係，但她又未被城市居委會接受為城市居民。當她需要一份失業證明報考一項考試時，街道委員會拒開，反而要她回到原有村委會去開證明，但原有 Shui 村認定她因購置安置房已經不再具有村民身分，造成兩邊互相推諉。這位女村民十分困惑她的戶籍身分，不知自己屬於哪裡，因為兩個地方都拒絕她。

33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 Xiang 村前任幹部。

有資格分享，外村與本村民通婚者，不論男女，都有資格分享，只是加權不同罷了。

無錫許多城中村皆按照上級政府規定，壓制村內反對意見，去做集體資產股份化，涵蓋那些有爭議資格的前村民。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利益分配衝突，並不是發生在勞動過程中掌握生產工具或財富的有無，而是發生在村民戶口的身分認定上。村民為增加分享租金，必須縮減分享人數以及排除那些不具村民資格或資格有爭議的村民。無錫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時，規定村民不得將股份賣給外人，股份買賣只限於村民之間或村內幹部，而且以固定出生與死亡日期來限制參與分紅的村民人數，³⁴ 形成人數只會減少不會增加，做大每個村民分到的紅利，藉此將村民綑綁成集體意識濃厚的利益共同體。在此意義下，城中村內部租金分配的衝突與村民成員的戶口身分緊密相扣，農民收租階級已成為尋租與租金最大化的利益共生集團。

溫州與無錫城中村集體資產雄厚，尤其溫州村民每月所獲生活津貼與福利照顧甚至超過某些城市居民收入，故徵地招工與城市戶口喪失對農民的吸引力。一些經濟實力較強的城中村民反倒成為城市居民羨慕的對象，甚至城市高學歷的專業女性願意下嫁低學歷的城中村幹部。³⁵ 農民收租階級的經濟保障，扭轉甚至打破毛統治年代城鄉老死不相往來的隔離狀態。

（三）農民收租階級維護共同利益的集體行動

農民收租階級瞭解其利益是與農村戶口身分結合，這不僅增強村民間的集體意識，而且提倡最大化租金的集體利益。在此前提下，村幹部的錯誤投資決策與侵佔資產都會引發村民抗爭，要求匡正與補

34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 Xiang 村前任幹部。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幹部時，也提到溫州市希望城中村資產能改制為股份合作制，來承擔村民變為居民時的社會福利。合作制的股份不能外流，只能在村民之間轉讓。

35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Jiu 村村民，當然這是少數案例。

償。溫州近年來村民抗爭幹部貪污腐敗的事件增多，有些是關於徵地賠償金分配不公正，有些是幹部侵吞資產與不智投資。為維護村集體資產，村民組織集體行動維護共同利益，透過街頭遊行的集體示威與抗爭，村民逐漸從傳統鄉民轉變為利益維護的收租階級，追求租金最大化。根據溫州 Shui 村村民：³⁶

我們村在 2001 年發動罷免村主任，因為他涉及貪污醜聞，並使村資產遭受重大損失。此外他壟斷村決策，經常和書記及其他幹部長期對立。我們村民為維護村資產，起而抗議，並要求分享村集體資產的營利。

另一位 Shui 村村民也表示：³⁷

在九十年代當村委分配補貼價公寓給村民時，有些公寓悄悄被市裡幹部買去。市政府幹部不是村民，沒有資格享有我們村補貼價的公寓。為糾正村幹部的錯誤，我們村民發動遊行，占領村委辦公室，向村委會要求已搬進公寓的市政府幹部必須支付市場價格購買公寓，他們必須補足差價。

相同的事件也發生在溫州 Feng 村。Feng 村村民在 2002 年發現村主任一個錯誤的投資決定，造成村集體資產重大損失，遂發起集體行動罷黜當時的村主任。³⁸ 最令人驚訝的是 Jiu 村所發生的事，村支部書記收到村民威脅生命的恐嚇信，指責他牽涉貪污，而且分配住房不公。由於擔心個人的人身安全，他便長期在村外流浪，不敢進入村內。當需要召開村務會議時，村支部書記便暗中通知其他村委幹部在秘密地點舉行會議。³⁹ 在這些案例中，村民早就採取集體行動維護他

36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村民 A。

37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村民 B。

38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Feng 村退休幹部，他正巧是當時被罷黜下台的村主任。

39 作者 2004 年訪問 Jiu 村村幹部。

們的共同階級利益，保護他們的產權。但當集體資產不保時，溫州村民則要求將資產變賣成現金分光。

無錫城中村民如何維護村資產與抗議不公分配？前已述及，無錫市政府按照進度，每年必須吸納周邊 250 畝農村土地做都市建設，這已成為市政府的政策目標，必須定期達成。在時間壓力與政策粗糙執行過程中，村民自然為維護共同經濟利益而抗議幹部的貪污、蠻幹與錯誤決定。尤其當宅基地補償不公、⁴⁰ 安置房偷工減料與地點過於偏遠，都遭致村民抗議，⁴¹ 甚至集體包圍鄉鎮政府表達憤怒與不滿。無錫村民與溫州相同，對幹部經營村集體資產的能力與廉潔缺乏信任，同樣要求在村解散成為城市居民前分光村集體資產。但無錫各級政府力量強大，尤其禁止農村集體資產變賣分光，⁴² 主導將村集體資產組織成股份合作公司，肩負村民變居民與城市社會保障銜接的財政支出，作為無錫市達到小康社會的政策目標。在村集體資產重組為股份合作公司之際，無錫較少發生村民不滿與集體抗爭活動，因為村民分享的資格爭議問題，早就被上級鄉鎮或街道搶先解決，不容村民意見介入。但不論溫州或無錫，城中村民為維護共同利益而發起的集體抗爭行動，已引起各級政府的注意，雖然這些集體抗爭具有傳染效果，引發鄰村起而效之，但尚未引發城市中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主要原因在於城中村收租階級維護共同利益的強烈集體意識是以村為邊界，因為村集體資產與紅利的分享只局限於村，並且與村民身分綑綁，這些抗爭活動自然難以引起村外其他社會人士的共鳴。如何解釋溫州村民的集體行為較無錫頻繁與強烈？

40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市 Huang 鎮鎮委書記。

41 無錫市政府將市郊藕塘區規劃為教育園區，為了興建職技教育學院，必須拆遷當地村民房舍，但村民對後續的安置房建造有意見，不僅地點偏遠，且安置房建造太粗糙，偷工減料，有安全問題。村民相當不滿，拒絕遷入，並進行抗爭，與當地政府僵持兩年多時間。見陶逸駿(2008)。

42 無錫市嚴禁城中村資產分光，但在無錫下轄的江陰市，就有資產較少的城中村，將資產全部變賣完畢分光而解散。

（四）地方政府主導與市場取向的社會政策

溫州與無錫的城中村今日仍在轉型當中，截至目前為止，無錫的都市轉型似乎比溫州平穩，許多城中村已順利轉變為都市居民社區，接受當地街道辦事處的管理。無錫各級政府也顯現較強的領導能力，從上而下強制執行社會保障政策，推動普及於所有城市居民的養老（老人年金）與醫療保險。無錫農村原有某些簡易的福利措施，保障農民基本生存，但與城市福利照顧相比，差距頗大。在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之際，城市政府應將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權益延伸給新興居民，但是無錫市以財政困難為由拒絕支付。換言之，農民必須自行支付轉變為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權益，因此原有村委會必須承擔此一財政任務。根據無錫 Liu 村支部書記：⁴³

我們村雖已轉變為城市居委會，但尚有 240 位村民仍為農民身分，村必須為他們辦理城市養老保險，以便銜接無錫市較高規格的福利待遇，和無錫市居民處於同等地位。村的農民養老金以前一個月只有 60 元，現在增加到一個月 315 元，但城市居民養老金一個月近 800 元。為補中間的差價，每個農民必須繳交 53,000 元給市勞動保障局。我們村要求每個村民自行負擔 10%，即繳交 5,300 元，村支付其餘的 90%，也就是 47,700 元。目前我們已經完成 180 位村民養老保險的銜接，光是這一部分，村就已經支出八百多萬元。此外，村還要支付村民醫療保險等其他許多費用，村哪裡去找這麼多的錢？……。

無錫的案例說明，市政府扮演聖誕老人慷慨發放禮物，要使每一個轉變為新興居民的農民都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但卻由村政府支付帳單。縱使財政困難，城中村也必須硬撐支付社會保障的差

43 作者 2005 年訪問無錫 Liu 村黨支書與村幹部。

價，幫助市政府完成全面普及的福利政策(universal welfare coverage)，邁向小康社會。

相較之下，廣州與溫州相同，都未強制村民轉變為城市居民時必須與城市居民享受等同的社會保障。然而廣州的城中村為村民提供大量公共財與設施，包括幼稚園、學校、老人與文化活動中心、宗族祠堂與辦公大樓，而且還有村辦合作醫療與養老津貼（每月 250 元）（藍宇蘊 2005: 175）。溫州的城中村也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與公共財，包括醫療保險與老年津貼，但這只局限於集體資產雄厚的城中村，一些資產薄弱的城中、城郊與偏遠農村，對村民社會保障則無以為繼，難以實現溫州市政府追求全面普及的社會福利。溫州城市轉型也常被城中村村民的集體抗爭打斷，因為村民享有資產的資格認定爭議不斷，使拍賣資產全數分光難以順利進行。溫州許多城中村已經開始制訂規則，進行資產評估、確認村民資格等程序，⁴⁴ 但是資產評估與變賣等過程十分緩慢，有些牽涉到外地投資的產權糾紛等，⁴⁵ 導致城中村轉變為社區居委會動作遲緩，延宕城市轉型的完成。不像無錫由村集體資產支付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社會權益，溫州市政府只能訴求於市場取向的商業保險，由個人按照自身財務狀況自行選擇。

根據大陸學者，在溫州 36.6 萬失地農民中，只有 2.1 萬(5.7%)村民參與村提供的養老保險，1.8 萬(4.9%)村民加入城鎮養老保險，另外有 2.7 萬(7.4%)村民享有村提供的部分養老年金，而絕大多數是沒有養老與健康保險的（溫州市委黨校課題組 2006）。甚至已將村集體資產分光而解散的 Hong 村，村民只拿到現金而沒有辦理任何福利保險。⁴⁶ 顯然多數溫州城中村民缺乏社會安全網保護，暴露在市場波動的危險中。一些農村會推薦村民參與某些商業健康保險，但很少村民這麼做，因為無力自行負擔。⁴⁷ 如何解釋溫州與無錫不同的城市轉型路徑、

44 這是溫州市鹿城區 Shui 村的例子。

45 這是溫州市鹿城區 Feng 村的例子。

46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

47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瑞安市 Cau 村黨支書。

社會政策的差異，以及村民集體抗爭的強弱？

五、溫州與無錫都市轉型、集體抗爭、福利政策選擇差異之解釋

當仔細觀察溫州與無錫在治理城中村轉型、解決農民集體抗爭、執行全民普及的社會政策時，無錫市政府似乎在治理效益與執行中央政策上超越溫州。為落實城市總體規劃的城鎮化目標，無錫市必須盡快掃除城中村的髒亂、擁擠與蕭條。為達到社會穩定，無錫必須壓制農民抗爭，排除村民偏好的集體資產變賣與分光的選項，癱瘓無錫城中村村民作為收租階級的共同利益。為實現小康社會，無錫必須強制城中村將集體資產組織為股份合作公司，擔負農村與城市福利銜接的財務重任。在強勢政府領導下，無錫採取從上而下的壓制策略，迅速完成上級要求的政策目標。相較之下，溫州各級政府較無力強制執行與村民經濟利益不符的上級政策，也無法有效解決村民之間的分配衝突，更無力去推行全民普及的社會政策。上級政府似乎不願介入城中村內的衝突與糾紛，縱使被迫介入，也通常無力處理。如何解釋溫州與無錫地方治理的弱勢與強勢？

（一）溫州基層治理缺乏協調與監督機制

當無錫進行都市擴張，所有郊區農村的鄉鎮政府或者轉變為城市街道辦事處，或與其他城市街道合併，共同負責農村轉變為城市社區居委會的協調與監督工作。因為原有鄉鎮政府的行政協調機制仍存在，農村在城市轉型中發生的所有衝突與爭議都由原有行政機關出面解決與協調，雖然過去的鄉鎮政府現已改為街道，但仍由同一批人負責。作者在 2005 年訪問無錫市 Huang 街道（原名稱是 Huang 鎮）時，街道書記與其他幹部晚間要去協調村民對宅基地拆遷補償與安置房分配的爭議，由於街道書記就是過去鎮裡的副書記，原本就熟識村民，透過既有的人際網絡與關係較為容易解決都市更新中的拆遷爭議，並

獲得村民的讓步。由於原先的治理機制透過人際關係保留下來，街道較能有效協調村民對拆遷補償與分配安置房的不滿，故無錫的城市轉型較為順利。

溫州城中村進行轉型時，原有上級鄉鎮政府被解散與裁撤，村被置於完全陌生的城市街道管轄之下。⁴⁸ 街道是都市行政體系，不熟悉農村事務。當城中村爆發要求清算資產與分配的衝突時，城市街道不願也難以介入。一方面街道人事編制小，沒有多餘人手與精力去瞭解與處理農村內部複雜人事與紛爭，尤其農村內部的社會組織、宗族勢力與資產經營管理。另一方面街道也沒有與村民及村幹部建立任何人際網絡去有效協調這些紛爭。根據溫州鹿城區幹部，Guang 街道光是處理與協調下轄的兩個城中村內部糾紛與衝突，就花去三分之二的時間與精力。⁴⁹ 由於街道從未與農村有過任何接觸，不熟悉也不瞭解農村，一旦將農村納入其行政管轄範圍內，街道花在協調與管理農村的行政成本過高，也缺乏效率，這是為何溫州城市街道面對城中村內部產權爭議與糾紛時，相當被動低調與不願介入的重要原因之一。縱使有時市與區政府會派幹部做為指導員，進駐城中村指導村清算資產組建股份合作公司，並進行私有化讓村民變股民，但往往遭致村民批評無效與無用，曠日廢時並浪費村資產。⁵⁰ 由於城中村與上級政府之間缺乏有效人際網絡進行協調與折衝，城中村民不時上街遊行抗議，將內部衝突外部化。與無錫相比，溫州過早撤除鄉鎮政府，在城市擴張中立即將城中村的行政管理置於城市街道之下，在過去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老死不相往來，城市街道在原有不足的人事編制下，如何去處理複雜有如燙手山芋的城中村？在基層治理中缺乏有效協調與監督機制，造成溫州城市轉型停滯不前，難以平息城中村內的分配衝突，更難壓制村民要求資產分光的集體抗爭，因此全民普及的社會保險就

48 作者 2004 年訪問溫州市鹿城區前身為街道書記的人大代表，談到溫州市郊的城郊鄉在 2000 年併入溫州市之後被裁撤，其下的 Hong、Xie 等村落直接交由街道管轄，令街道十分頭疼。

49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幹部。

50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Feng 村上級政府下派的指導員與村民。

此流產。

（二）溫州歷史遺產的務實主義

相較於無錫各級政府對地方基層事務的頻繁干預，溫州市向來對地方事務就比較自由放任，不太干預地方事務與強加中央政策。縱使溫州市政府支持中央政策，贊成保留村集體資產用以支付村民變居民的社會福利，但溫州市政府不像無錫那樣強制執行，反而默許資產分光，沒有進行打壓。⁵¹ 溫州各級政府的行事風格可向上追溯到 1949 年以前溫州地下黨與游擊隊遺留下來的務實傳統。不同於無錫，溫州在 1949 年是靠地方游擊隊與地下黨自行解放，在毛的正規三野紅軍抵達之前，溫州地下黨就已經接收地方政權，建立起自己的黨政軍行政體系，阻擋三野二十一軍團進入溫州奪權(Liu 1992)。更重要的是，溫州地下黨與游擊隊長期以山區為活動基地，需要糧餉與資源，在抗戰時期的生存之計，就是與地方商人、資本家、地主仕紳合作，取得同情與信任。當時地下黨更在山區與地方商賈共同經營木材生意，取得利潤得以生存。溫州地下黨的務實作風，偏離毛的延安激進政策，其來有自。溫州地下黨的務實精神一直影響地方政府作為，可以解釋在毛時代地方之所以偏袒私營經濟，對農業集體化與人民公社建立缺乏興趣，以致溫州數次被打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整肅。正因為這種務實態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使地方政府較少伸手干預地方基層事務，隨遇而安、無為而治，使溫州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以來第一個以私營企業發跡，並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地區(Liu 1992)。

無錫地方幹部並不具備溫州官員這種凡事務實，而且同情地方利益的傳統。不像溫州，無錫在 1949 年並沒有強大的地下黨與游擊隊做自我解放，反而是毛渡江南下的第三野戰軍解放無錫，並接收地方政權（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 1989（上）：41）。由於地方政權掌握在外來幹部手中，並未與地方利益糾結，無錫幹部自始擁抱上級政策，認

51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鹿城區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

真推動農業集體化與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轉型，在上海的嚴格監督與地方強制執行中央政策下，無錫不惜犧牲地方利益與傳統民營企業，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重鎮。當經濟改革開啓，無錫仍擁抱集體經濟的鄉鎮企業，堅持走社會主義正統道路，反而視溫州的私營經濟為旁門左道。⁵² 然而當九〇年代鄉鎮企業在私營經濟與外資企業夾攻之下無法繼續存活，才被迫進行私有化以回應市場經濟轉型，但政府主導地方發展的傳統沿襲至今。正因為無錫市政府要確保中央政策在農村落實，鄉鎮政府務必要能有效監督，故在農村轉型中，鄉鎮政府的監督與協調不可廢除，因此在都市轉型中由鄉鎮直接轉型為街道或與城市街道合併成為必然。相較之下，溫州城中村民不斷以集體行動向地方政府施壓，不僅抗議村幹部的貪污腐敗，而且要求清算資產，分光了事。從下而上的村民集體抗爭，在癱瘓溫州的城中村轉型之餘，並迫使溫州採行市場取向的商業保險，偏離中央政府要求的全民社會保障。

六、農民收租階級受益或受害？

在利益分配紛爭中，農民收租階級是受益者或受害者？由於收租階級不必參與勞動過程，靠收租就能維生，他們多數隔離於社會，失業在家。更由於平均教育程度低，欠缺專業知識與技能，收租階級的第二代很難在城市正式經濟部門找到正規工作，因此收租階級及其下一代難以在城市社會階梯中向上爬升。由於城中村收租階級的封閉性，他們多半與家人或鄰居來往，又因多數沒有工作，缺乏與大社會中次級團體接觸來往，生活圈狹窄單調。由於無所事事、遊手好閒，收租階級的第二代很容易尋找刺激而誤入歧途。溫州城中村許多年輕人，參與賭博、吸毒、甚至幫派犯罪。⁵³ 溫州 Shui 村村民談到：⁵⁴

52 作者 1987 年訪問無錫縣幹部，所遇鄉鎮幹部幾乎異口同聲批判溫州資本主義的歪路，認為只有蘇南地區的鄉鎮集體企業才是社會主義正統。

53 作者 2004 與 2006 年先後訪問溫州 Jiu 村、Shui 村、Feng 村等村幹部與村民，皆聽到

我們村村民失業率高達 80%，凡是工作不具保障，不在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工作的，都算失業。那些開小店與經營攤販的自由度高，可做可不做，實在算不上正式就業。溫州人寧願失業在家，也不願屈就做那些低工資的工作。溫州的低薪工作都是外地打工者在做的，如踩三輪車、清潔工、開出租車等。許多年輕村民失業在家，並以賭博、吸毒、參與幫派為樂。

無錫城中村民也面臨相同失業問題，但無錫城中村民的失業率只有溫州的一半，在 2002 年大約 40.3%（張壽正 2006）。縱使如此，無錫和溫州一樣，城中村民多半從事城市低階工作。雖然城中村民受益於城市擴張的地價上漲，成為收租階級，但是農民安置房地區房價低廉、房租便宜，吸引許多外來民工聚居，他們教育程度低，多數從事低收入的下層工作，生活習性與城市居民不同，製造許多噪音，行為粗魯，並匯集髒亂與貧窮，甚至犯罪，無錫市民避之唯恐不及。對城中村民而言，他們雖然重新註冊為城市居民，但是居民身分並未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帶給他們期待的向上流動，反而不少淪為城市下層階級。城中村的收租階級並未在城市轉型中變成都市居民而受益，社會主義的福祉反而帶來社會底層的歧視，與偏差犯罪同流，這是誰也意想不到的結果。

七、結論

本文建構以租金為基礎的收租階級理論，強調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地價暴漲促使各城鎮均出現「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農

年輕村民的賭博、吸毒等犯罪行為。作者 2006 年田野調查時，於白天時間進入某城中村地界，就看見街頭不少年輕人三三兩兩聚賭，有賭撲克牌，也有聚桌打麻將。但當遠處有人高喊公安或某個暗語，聚賭的年輕人立即做鳥獸散。作者在城中村街頭常見的布條標語是反吸毒口號，驗證了村幹部與村民的說法。

54 作者 2006 年訪問溫州 Shui 村村民。

民收租階級建立在村集體資產所衍生的社會主義租金分享上，收租者的階級意識又被村民身分的戶籍制度所強化。集體產權與戶籍制度不僅增強村民的集體認同，而且引發維護階級共同利益的集體行動。集體資產的經濟利益，遠超過城市戶口的吸引力，並將村民緊密綑綁，中國社會主義政權從未出現過農民收租階級如此強烈的集體主義。

中國自 1950 年代實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村集體資產基礎上，建立統一勞動、管理與分配的人民公社，藉此消滅中國農村長期以來地主對佃農的階級剝削，追求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縱使如此，農業集體化斲喪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長期飽受中國農民抵制，因此當中國於 1970 年代末推動農業去集體化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農地分給個別農戶，恢復傳統的小農經營時，受到中國農民由衷歡迎。反諷的是，在二十一世紀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城中村」與「農民收租階級」，卻是以村集體資產衍生出的社會主義租金與村的集體認同為基礎。

本文比較溫州與無錫都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轉型與農民收租階級，發現兩地城中村轉型路徑、農民集體抗爭強度、社會政策實踐的差異。溫州城中村轉型遲滯，村民集體抗爭行動激烈，要求變賣與分光所有村集體資產，拒絕政府要求以集體資產組建股份合作公司去擔負村民的社會保障支出，癱瘓溫州市政府追求的全民普及社會政策。相較之下，無錫在地方政府強勢領導下，快速推動城中村轉型，使農村與城市融合，落實無錫市的城市總體規劃，並壓制村民要求的資產變賣與分光，強制將城中村集體資產原封不動組織成股份合作公司，承擔村民的社會福利支出，以全民普及的社會保障與小康社會為目標。

本文採制度論觀點解釋溫州與無錫在都市轉型中呈現的差異。本文強調溫州 1949 年自我解放的歷史路徑，導致較為務實的地方治理傳統，彈性解釋與處理上級的高壓政策，以致地方政府向來較少直接干預農村生活，呈現「無為而治」。在都市轉型中，溫州市政府無所用心，直接撤銷農村基層且居於政策協調的鄉鎮政府，轉由城市街道

接手農村事務，然而街道卻無力處理與化解城中村內部的分配衝突與紛爭，以致溫州城中村轉型停滯，村民集體抗爭激烈，走向由下而上的市場取向之福利政策。對照於無錫，由於 1949 年外來幹部接收無錫地方政權，徹底執行中央政策，無懼於農村反抗，在基層治理中地方政府時時干預並有效監督農村治理，鞏固社會主義體制。因此在城市治理中，無錫市政府依循由上而下的強勢作風，直接將管轄農村的鄉鎮轉變為城市街道，負責城中村轉型中的拆遷、補償等事務。由於原有鄉鎮的政策協調與人際網絡仍繼續運作，致使無錫城中村轉型較為順暢，壓制農民集體抗爭，強行貫徹全民覆蓋的福利政策。由於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不同，導致兩地都市轉型、農民抗爭與社會政策顯現差異。

在中國城鎮發展中，縱使城中村民已轉變為城市居民，但是城市戶口並未改善多數城中村民的社會地位，符合他們向上流動的期待。雖有少數成功者爬上社會階梯頂端，但多數收租階級流於失業、待業，並陷入偏差犯罪，使他們從城市戶口的雲端跌入谷底，備受歧視，社會主義的福祉似乎變成恥辱，這是中國都市化發展帶來的一刀兩刃效果，使城中村民既受益又受害。

在中國城市轉型中，只要集體資產保存，收租階級就會存在，縱使他們戶口身分已改變，農民收租階級的集體記憶長存。因此集體產權制度持續複製社會主義的集體性，形構收租階級維護共同利益的集體抗爭行動，造成中國市場與都市轉型中的再集體化現象。

誌謝：作者感謝國科會提供的研究補助(NSC94-2412-H-004-009; NSC95-2420-H-004-050-MY3)。本文草稿曾發表於「後社會主義轉型中的階級政治、公民權與社會福利」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台灣社會學》合辦，台北月涵堂，2009/5/15）。作者感謝簡旭伸、吳介民、施世駿等教授與參與同學提供的寶貴意見，並感謝政治大學社會所「當代社會研究與思辨」一課全體師生的提問。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美國亞洲研究年會(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oston, MA, USA, 2007))，作者一併感謝本研究案助理黃騏弘的資料蒐集協助，以及所有接受作者訪問的大陸地區學者、農民、鄉鎮與村政府幹部。

參考文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2008)中國統計年鑑 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方勇、張二震(2007)分報告 5：經濟國際化與新蘇南模式。見楊衛澤、洪銀興編，創新蘇南模式研究：無錫的實踐與探索，頁 172-206。北京：經濟科學。
- 王安嶺(2007)關於惠山地區地方政府治理結構階段改革實驗報告。西安：西北大學。
- 朱康對(2003)來自底層的變革：龍港城市化個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
- 李培林(2003)村落的終結。北京：個人出版。
- 金浩、王春光(2008)2008 年溫州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政協無錫市委員會(2008)關於制訂“城中村”改造相關政策的建議，見政協無錫市委員會網頁。無錫：政協無錫市委員會。<http://zx.wuxi.gov.cn/zxkw/2006nd6q/jyxc/883595.shtml>。亦見無錫政協，2006 年第 6 期，提案追蹤。
- 唐岳良、陸陽(2006)蘇南的變革與發展。北京：中國經濟。
- 張壽正(2006)三農問題。無錫：個人出版。
- 陶逸駿(2008)釘子戶的財產權——中國農村徵地補償協商成就案例分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無錫市統計局(2000-2007)無錫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0 年至 2007 年，見無錫市統計局網頁。無錫：無錫市統計局。<http://big5.wuxi.gov.cn/xxgk/jhgh/index.shtml>。
- 溫州市委黨校課題組(2006)溫州市被徵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溫州論壇 1: 74-78。
-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1989)當代中國的江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談鎮(2007)新蘇南模式與溢出效應和根植經濟。見黃文虎、王慶五等著，新蘇南模式：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全面小康之路，頁 117-138。北京：人民。
- 鄭孟煊、黃紹汪編(2006)城市化中的石牌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謝健、奚從清、方立明等(2004)城市社區建設研究——溫州模式的一個新視角。杭州：浙江大學。
- 藍宇蘊(2005)都市裡的村莊。北京：三聯。
- Breen, Richard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Weberian Class Analysis. Pp. 31-50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c Olin Wri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hanan, James M. (1981) Rent Seeking and Profit Seeking. Pp.3-15 in *Toward a*

-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Eyal, Gil (2003)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sing, You-tien (2008) Socialist Land Masters: The Territorial Politics of Accumulation. Pp. 57-70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ited by Li Zhang and Aihwa O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ing, Lawrence Peter, and Ivan Szelenyi (2004) *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u, Xiaobo, and Elizabeth J. Perry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 E. Sharpe.
- Liu, Yia-Ling (1992)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130 (June): 293-316.
- Siu, Helen F. (2007) 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4(2): 329-350.
- Sørensen, Aage B. (2005) Foundations of Rent-Based Class Analysis. Pp. 119-151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c Olin Wri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c Olin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Marxist Class Analysis. Pp. 4-30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c Olin Wri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Li (2008) Private Homes, Distinct Lifestyles: Performing a New Middle Class. Pp. 23-40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ited by Li Zhang and Aihwa O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